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 如是文學雜誌的現代性—論中介概念的詮釋 ※

※※※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0-2411-H-032-007

執行期間：90年8月1日至91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蔡淑玲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劉靜華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

中華民國 91 年 10 月 30 日

符號的物質性-克莉絲蒂娃的現代性與中國語文的關聯

克莉絲蒂娃於 2000 年修訂、重新出版《中國婦女》(Des Chinoise; ed.Pauvert 2002; Des Femmes 1974 初版)。序言〈如是中國〉(“La Chine Telle Quelle”)裡提到 1974 年與梭萊思(Philippe Sollers)、巴特(Roland Barthes)、皮列奈(Marcelin Pleynet)、瓦爾(François Wahl)等組團訪問中國(拉崗 Jacques Lacan 因事無法成行)，可說是西方學界深入中國的第一團。克莉絲蒂娃因出版社補助一萬法郎，將女性議題列為訪識的焦點。之後寫成《中國婦女》一書，但也因此一行程與書籍的出版使她自此放棄了成為漢學家的志願，並和女性主義等政治主張漸行漸遠。放棄成為漢學家是因為：雖然擁有中文學士基礎，但自覺無法充分了解並詮釋中國文化深奧的精萃，又不願不可避免地重踏所謂東方主義殖民觀點的西方漢學窠臼。離開女性主義的政治氛圍，則是當年出版社威脅要她放棄父姓、夫姓，冠上女總編的姓氏(Joyeux)，並罔顧作者校稿權益，逕行付梓。至於和其他在六八

年後狂熱相信共產黨的西方知識份子不同之處則是¹：

¹早在1963年，梭萊思與其他《如是》雜誌成員對毛主義便十分狂熱，之後更積極介入左派政治活動。當時，毛主義、馬克思與拉崗、德希達可以說是法國左派知識界理論的基本架構。所謂後結構(post-structuralists: Derrida, Barthes, Kristeva, Foucault, Lacan, Denis Roche, Maurice Roche, and Marcelin Pleynet)主義者群集於極受爭議但影響至鉅的文學雜誌《如是》旗下，一如大衛海曼(David Hayman)在梭萊思所著《書寫與極限的經驗》一書之英譯本序言裡說：「《如是》進出法國共產黨可說是當時知識界風尚的領導者。」《文學雜誌》(Magazine littéraire no 65, 1972)一期即反應當時知識界對《如是》又敬又怕的評價：「只要聽到梭萊思這個名或他那文學雜誌《如是》，就叫人牙齒打顫。晦澀難懂、知識界的恐怖主義等當年加在超現實主義身上的責難不一而足？從六十年代支持新小說的文學主張、七十年代對共產主義的狂，《如是》引起的負面評價可說比正面要多得多。」〈屋頂〉，菲力普梭萊思於一九六七年寫成的論文，標示了《如是》雜誌創於一九六〇從政治介入轉向文化倫理關懷的轉折。此一轉折在《如是》提倡的文化現代性構思中極為重要，標題〈屋頂〉勾勒出的意象即可說明《如是》所謂現代化落實在文學文化上的思想邏輯：一種聯結兩造拉距勢力的中界空間，一道論據的極限，促成黑格爾主人與奴隸永恆的辯證。梭萊思寫道：

我們要往一個方向行進，接近廟宇的屋頂(le toit)，在其上睜開雙眼，無所畏懼，看見各種可能的對立之間的關係。這個屋頂並非布烈東所謂的理想之點，所謂諧和生命與死亡的精神高點，使對立不再矛盾。我所謂的高點，不是指精神的或是觀點的，而是更物質地說：一種空間的關係、網路的匯聚點。我們與布烈東兩者之間說法的相異處十分關鍵，從中可知為什麼巴岱儀和布烈東對黑格爾的看法意見相左。其實問題不是從屋頂上可以看到什麼，而是這個屋頂到底是什麼？連帶要問的是：為什麼基本上大家連想都沒想到去思考有這麼一個屋頂存在著？

此一中界空間挑戰所有論據的極限，兩者之間的概念使得二元辯證無法獲得調和統一，導致語言中傳達信息的符號觀念-意符/意指二分後再結合指涉的功用瓦解，造成巴岱儀所謂語言的消亡，徹底挑戰人本主義的世界觀與思想模式。

在〈屋頂〉一文裡，梭萊思對共產黨的憧憬仍殷。然而透過對巴岱儀思想的闡釋，針對踰越一詞所提的解釋已經預見了七十年代後《如是》與共產主義的決裂，追隨超現實與前衛藝術的腳步，梭萊思本欲動搖體制，但同時卻明白點出自己和布烈東藉由否定力量調節矛盾的路線有所區別。簡言之，《如是》所謂的現代性並非一系列可供指證的特點，而是一種思維模式：將黑格爾的辯證矛盾從最終的調和統一解放出來，與宗教神學賴以建基的本質/表象、神隱/再現所涵帶的優劣之別相對，形成永恆的張力與拉距。兩造勢力不以對立為互動模式，而在相生相剋中互斥互立，從而衍生的文學文化議題如：完整意義結構裡的異質雜音、社會主流律法排擠的邊緣弱勢等問題，若不以對立消長的邏輯思考，其間的關係將可開放出多少其他意義生產消費的可能性？所謂二元的物質辯證即〈屋頂〉一文重點所在。肉體、動物性、死亡、暴力、性愛等被西方主流思想界、象徵再現系統排除或淨化的物質如何回覆侵擾歷史？如何在科學哲學論述之極限-亦即語言、再現象徵系統的極限之外看見神話與神秘的原始？《如是》梭萊思所謂的現代性：

如果想把語言從這樣的困境拯救出來，就必須認知暴力(動物性)之為人性本質，原則上是被消音的，因整個人性都可說在沉寂中說謊，也就是說語言本身就建立在謊言之上這個說法樹立了新的里程碑。里程碑，因為對意識提出了嶄新的定義、解讀所有官方歷史文本，更進一步發現被排除抹滅的、審檢消音的，以及被抹黑的。里程碑，因為呈現了所謂「實証」的論述和被其排除丟棄的部份

身為保加利亞的放逐者，我自認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因此不像西方布爾喬亞年輕人一般受惑於中國的共產主義。在精神分析與人類學之間，令我驚異的是人性的多樣性，促使我去發現：如果宇宙以陰陽為說，以象形為文字，那麼這個世界上將會如何展現另一種權力的模式？尤其是所謂社會主義的權力。

(Kristeva 2000: 8-9)

回國後立刻發表的短文（“Les chinoises a contre-courant”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No. 592, août, 1974）裡，提到中西最大的差異是：文字對應的思考模式如何影響兩性關係的差異。克莉絲蒂娃認為中文口語和文字不分，但書寫臣服於多樣的規則，依據陳述內容邏輯的變化，表現手勢（如書法）、語氣（平上去入、抑揚頓挫）之風格。象徵系統在實踐中完成，而非客觀獨立存在（如字母文字以文法句型抽象規範），沒有聯結唯一真神真理聲音的動詞之觀念（“Verbe”）。男人和女人的身體之間無所謂差異阻隔，而在經濟象徵系統裡互相應和中相互成就。亦無所謂踰越，追求法外的慾望客體，而以母親為中心，環繞一微型的孩童社群(une micro-société enfantine)，圓轉形成生產體系。而西方則以神性、父權、動詞為中心的意義生產模式則將母親的功用定位在孩童進入象徵社會的中間媒介，以受洗為職責帶領小孩進入社會社群結構(復歸於一)。

當然此一社會型態的比較在現代中國或台灣均不再適用。但我們在此的興趣針對的是克莉絲蒂娃所提相應於中文系統可能產生的思考與文化模式，並探究中文之為異質文化如何啟發影響克莉絲蒂娃對現代性的思索，專注於意義生產模式與思考邏輯的改變。克莉絲蒂娃語重心長地說：「她們中國婦女的問題我們無法解決，同樣的不能期待中國在封建與孔子儒學裡提供我們解決困陷在一神教與資本主義裡的困境。」(528)二十五年後再版，克莉絲蒂娃說：若是重寫，將會更深入探討所謂資本一神主義(monothéisme capitaliste)發展而出的兩性關係結構，再進行描述融合了道家與孔子儒學的中國文化裡中國女人的面貌。(11)克莉絲蒂娃認為西方女性權益的發展的確程度上改變了社會律法

之間的關聯。那被丟棄到別處的，因而更見強調，甚至根本被重覆張顯。最後稱之為里程碑，是因為讓我們看見了「人性」必然引發自身「非人性」的辯證關係。

根據梭萊思的說法，此一永恆二元的思維模式從中國陰陽運行的說法得到極大啟發：

可以說這就是喬治·巴岱儀的「二元物質論」：不期待由最後的認同與一統來調合矛盾對立，而是一開始就分立兩個對等的原則，「二」不從「一」分裂而來，而是先於一就存在。德尼何列指出此一二元論「並不是在一個世界裡分出二個原則，而是根本就分成兩個世界」，並說「二元思想就是在這種二元性的開展中。即所謂的二者之間，側身立足運作張力」。此一無從確立立場，甚至可說必然是「謬誤」的，只因位處兩極同樣「真確」的想法之間...唯一聽來接近這種對我們而言深奧難懂卻仍可理解的思維模式就是中國思想：陰與陽一開始就是二元的，而道則完全沒有一統的概念，更沒有神的意味，應該說是矛盾生成之「處」。

《如是》雜誌創辦者梭萊思在毛主義的革命狂潮中找到思想的應和，對中國哲學的熱愛不過是因為在其中找到修正黑格爾的靈感。在上述二元物質辯證的框架下，克莉絲蒂娃於七十年代加入編輯職務後，亦在其論述中將思考重點放在反襯思考(antithèses)的意義生產模式上，認為批判對所有律法標準時，必須先考慮每個特殊文化語言系統中分割意義的現代性篇幅。

的平等，但是對兩性相處的問題模式內涵卻無真正的精進。克莉絲蒂娃最終並不放棄觀察中國女性在當今經濟發展與全球化趨勢下所能扮演的角色，並指出使中國女人具備提供迥然於西方觀點的兩性模式之優勢，端看她們如何從母語中擷取思考邏輯的精粹，適之以現代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變化。序言裡最發人深省的是這段話：「全球化有待重估：男人/女人，精神/肉體，聲音/手勢，口語/書寫在各個文化裡劃分模式迥異，而中國人的思想更蘊含另類思考慾望、意義與政治的潛力。」(13)

八十年代克莉絲蒂娃將「從傳統中擷取思考邏輯」落實在西方「母親」的重寫，在宗教論述上以聖母瑪麗亞為象徵，轉換了中間媒介的意義，以精神分析理論為輔，提出象徵系統裡既可成就父權次序亦可顛覆繼承意義、啟動驅力的中界概念 (chora ; entre-deux)，將西方靈肉辯證終歸於一的對立邏輯轉化為相生相剋的永恆運動，將意義的生產落實在互動的實踐裡，從而提出新的主體建構與意義生產模式。黑格爾框架下靈肉辯證的過程在克莉絲蒂娃改寫下更偏重肉體物質對社會主體型構的影響。以母體女人為象徵的物質肉體不經意地回反侵擾父權的象徵次序，兩者之間的互動，從現象學傳統而言，既是意義的阻斷或說認知主體本身的目盲、意識的中斷，因而回神體認異質他者的存在。從符號學的角度，那主體本身就不是一個完整連貫的意義生產者，而是語言物質在特定時空下流轉成型的結果。源自母體肉身的記憶則如地下因果，無時無刻不威脅著翻覆社會象徵界排除物質肉體而成就的秩序。在否定動能或說死亡驅力的演繹下，主體與型塑主體的社會之間形成抵抗/內化同時進行的張力，主體既要壓抑轉化肉體物質以期進入象徵系統卻又無可避免產生抵觸排斥現象，其間造成異化相對於完整一貫的意義系統將導至語言的混亂或樂觀地說：語言修辭的活化創造。將佛洛伊德生死驅力視為不斷拉距的矛盾掙扎，克莉絲蒂娃將主體內在的異化聯結外在社會法規的壓制與經濟生產模式造成的外在異化，改寫黑格爾異同辯證合一的意識經驗，在驅力受制的反斥上關注異同辯證的邏輯，探討異質侵擾的意義生產模式如何影響改變知識、科學、宗教等意識層面的語言邏輯，進而活化語言模式、思想價值，達到詩語言之改革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1978)²。克莉絲蒂娃回歸物質世界(母體身體)重塑認知主體(社會象徵)，也因而為兩性關係另闢蹊徑。從中多少可以追溯之前中國語言文字思考模式的省思。

中國語言文字提供了思索現代性的邏輯靈感，克莉絲蒂娃引介中國文字語言的運作方式，在批評西方語音象徵系統時強調「中文裡，西方一向認為正統的指涉-意符/意旨 (signifié/significant) 關係被改變了，之間的分界不再明顯，更沒有優劣級等之別。意義聲音實物融合為一字形表現，一如戲劇空間裡各司其政又相互對應合作的演員」。³ 據克莉絲蒂娃的分析，中文運作的方式與西方字母語言不同「西方人若要更確切地了解就要把所謂符號-意符/意指的概念轉變成指派(暫譯)« dé-signation »，指派者

2 參考蔡淑玲從〈克莉絲蒂娃的宮籟探主體的異化與論述的極限〉，《中外文學》第30卷第8期2002年1月 pp. 158-182.

3 *Le langage, cet inconnu*. First published under the name Julia Joyaux in the collection "Le point de la question" Ed. SGPP in 1969, then by Ed. Du Seuil, 1981.

« dé-signateur », 及被指派者« dé-signaté »。中國象形文字並非物的命名指派，而是指派的指派--意即指派的姿態 (79)。研讀六書造字的邏輯後，擁有中文學士基礎的克莉絲蒂娃認為：中文以切割重組的造字方式，若以現代語言學而論，沒有一個字的意義是固定的，必須在句型中視上下文而定。(77)援引法國和學者葛內之研究(La pensée chinoise, 1934)寫道：中國字和西方符號的觀念有根本的差異，西方強調一個字指涉的抽象觀念必須精確到猶如本質放諸四海皆準；象形字則在一組特殊卻不明確的形象組合中突顯意義，總要靠句型文法等上下文關係而定(74)。克莉絲蒂娃指出：中文乃世上唯一沒有被語音抽象化的文字，其特殊性避免了語文過度抽象的表現。在字與物的關係中，中國文字仍緊繫於物(不會在觀念的抽象過程中，藉概念抽離而成意符)，而不失之於物，而是將之轉化到另一組空間系統中。於是象徵與真實融合為一(而不致造成符號系統抽象化中產生的空缺匱乏)。

中文組合的結構句型的特性及物質性在在提供了《如是》雜誌構思文化現代性。筆者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啟發即是：將西方語言從神聖的指涉與神學的框架裡釋放出來。書寫(écriture)成為政治權力運作場域中互動成型的結構，⁴在中文意義製造模式中來理解《如是》提出的書寫概念，語言不再是再現，而是指派權力姿態的場域、實物的終極意義在書寫的踰越過程裡，可說與不可說之間，不斷被推移置換。一如梭萊思所說：說明某事物就是將自己放置在與此事物同在的空間裡，使得說明和事物兩者並非互相抵消，而是相伴共存 (110)。踰越的書寫因而是原始自然與神聖並存的世界，從而衍生意符的換置遊戲 (113)，成為論述極限的經驗。其中，靜默混同聲音，在語音系統與象形排組中隱約看見指派的姿勢、書寫者的肉體。

《如是》雜誌(Tel Quel)在六十年代受馬克思、恩格爾影響提倡的文學改革運動中，將靜態凝現(la représen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的文學觀念鬆動成書寫文本的動態實踐(la pratique de l'écriture)，並從語言的質變切入現代性(la modernité)，重新詮釋現代文學如卡夫卡、普魯斯特、喬艾斯、馬拉美、羅特亞蒙等文字書寫的現代質地。所謂意識流、時空交錯、形式技巧、象徵手法等乃是外現的徵兆(les symptômes)，造成現代與先前十九世紀才真正成型的文學迷思(le mythe de la littéralité)之斷裂的因素，是語言指涉功能和擬現作用的崩潰瓦解：文字不再侷限為表達或傳遞意義，而是裁用的物質或素材，書寫本身成為目的，其審美層次更接近形象表演藝術如戲劇、舞蹈或書法。亦即語言和現實感官的聯繫邏輯產生了根本的變化，與其說模擬不如說形變，就語言本身的結構組織來進行意義元素的選擇(la sélection)和整合(la combinaison)。結合結構語言學建立在元素的整編

縮合的形變概念上，思考西方以音節、文法、句型順序排列的語言邏輯而產生變異，其中異質原素的發酵作用不少來自埃及與中國象形文字的探索。西方文學轉型為書寫，在

⁴ 《漢字文化學》何九盈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何九盈指出：從對字型誤解，可看出意識型態、政治意圖、神話思維、迷信思想、古代習俗、陰陽五型等交錯混雜的思想體系。舉例：武，被認為是「止戈」，由春秋五霸楚莊王提出為的是顯示武德。許慎《說文解字》亦舉為正解，直到甲骨文出土，方改變原有解釋：止乃四之日，舉趾之趾，足也，行動之意。P. 219

語言的反省中，曾深受中國象形文字的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造字方式的啟發(意義元素的選擇編排與縮合)。梭萊思(Philippe Sollers)便聲稱現代書寫不再以傳統意象為經營對象，而是一種類似中國象形文字形變的概念，一種象形與聲韻的結合(Sollers 1966)。這當中的誤讀與同化現象不可避免，梭萊思與克莉絲蒂娃最終仍回歸到黑格爾二元，企圖修正的是西方觀念下的理性傳統。對中國文化與中文的研究與興趣停留在去脈絡化的文字與思想之抽象邏輯。然而本文重點不欲抓住這點討伐他們的誤讀，筆者自問對中文與中國思想的了解皮毛又何來能力匡正？而是中文邏輯在他們的解讀下到底如何協助開發了法國知識界在七十年代對現代性提出的觀點和闡釋。在我們移植西方現代文學的精神形式技巧的過程裡，是否在根據本土現實環境與思維模式的限制下進行的詮釋與形變中(在現代主義文學的定義搜索)中，漏接了西方(如法國)語言文字「混中」異化的思索關鍵？而西方根據理性與再現傳統進行的現代性思索，所謂後結構已至於後現代的思潮移植到台灣後 值得深思的是否是我們藉以辯證的現代性為何？

生長在台灣受西方教育的我，驚覺自己熟悉《中國婦女》前半段西方思考模式的敘述，反而對後半部中國文化社會的描述感到陌生。事實上，在台灣現代化及西化甚至美國化的發展過程下來，所謂孔子儒學、一神教與資本主義早已萬流匯聚、混淆難辨。所謂中國特殊的象形文字所對應的思考模式與亦在現代社會裡被排除遺忘。我們以西方的宗教語言與觀念所衍生出來的理論套解台灣與中國的文化與文學，忽略中文之為符號與西方文字的差異。如何調整現在思考模式與結構，對我來說意味著對中國語言文字的重新認識。

參考書目

- Forest, Philippe. *Histoire de Tel Quel* 1960-1982. Seuil, 1992.
- Hayman, David. *Writ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mi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Kristeva, Julia. *Des Chinoises*. Des Femmes 1974 初版; Pauvert, 2001.
- “Les chinoises à contre-courant”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No. 592, août, 1974. Polylogue. Seuil, 1977.
- . *Le langage, cet inconnu*. Paris: Seuil, 1969, 1981.
- Sollers, Philippe. *L'écriture et l'expérience des limites*. Paris: Seuil, 1968.
- Tel quel*. No. 53, printemps, 1973.
- Tel quel*. No. 91, printemps, 1982.
- Tel quel*. No. 94, hiver, 1982.
- L'infini*. No. 79, Été 2002.
- Magazine littéraire*. No. 65, 1972
- Critique*. 195-196, août-septembre, 1963.
- 漢字文化學. 何九盈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1.